



## 藏羚羊：青藏高原生态变化的见证者

从100多年前的100万只，到如今成为濒危保护动物，藏羚羊不仅见证着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其种群发展也考验着我国在青藏高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能力。

■ 文 / 康蔼黎 毛世平

电影《可可西里》的公映，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五福娃之一采用藏羚羊形象，让藏羚羊这种栖息于海拔4600~6000米的荒漠草甸高原和高原草原的动物，成为青藏高原上最为著名的物种。“青藏高原的代表物种”，这个名头对于藏羚羊而言，当之无愧。由西往东，藏羚羊的行踪从印度拉达克开始，向东延伸1600千米，穿过西藏和新疆南部边缘，到达青海鄂陵错以西。从北到南，藏羚羊的身影在昆仑腹地出现，一直到西藏

南部的玛旁雍错东部附近。藏羚羊的分布和迁徙状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青藏高原，尤其是羌塘草原（包括可可西里）上广阔的草原景观的连续性。

### 藏羚羊种群数量由降反升

第一次和藏羚羊打交道，是在2005年春夏之交。当时，笔者跟随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界传奇人物乔治·夏勒博士一同在昆仑山西部的腹地进行

藏羚羊母幼迁徙行为的研究。那个地方拥有一处藏羚羊的产崽地，每年5—6月份，都有来自西藏阿里地区的藏羚羊在此繁殖后代。它们总是脚步匆匆，在怀孕的最后一个月，跋涉两三百千米到达这里，然后在孩子长至一周左右便开始启程返航。除了这个种群外，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至少还有其他4个这样的迁徙种群。其中有两个跨省份迁徙，分别从西藏羌塘东部和新疆阿尔金山迁徙到青海可可西里。

和其他许多有迁徙行为的有蹄类动物相比，藏羚羊只有雌性个体会作如此长距离的迁徙。根据西方探险者在100多年前的记录分析，当时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数量可能达到100万只。不过，随着人类足迹在这一区域中的增加和扩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70—90年代，出现了针对藏羚羊的大规模猎杀，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它们精美的羊绒。中间商把收集到的羊绒走私到喀什米尔，由当地人通过传统工艺织成沙图什羊绒披肩，以满足其他国家少数人对时尚的疯狂追求。在那个时期，其他动物同样也没有能够逃脱这样的厄运。当乔治·夏勒博士于1998年出版《青藏高原上的生灵》一书时，他对中国国内藏羚羊在当时的数量估计为7.5万~8万头，这个数字在百年前估计量的10%以下。

值得庆幸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对于动物保护的投入日益增长。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和枪支没收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03—2006年，乔治·夏勒博士等在《兽类学报》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羌塘草原的藏羚羊和藏野驴的数量都出现了恢复。西藏自治区林业勘探院的刘务林在其2004年的专项研究中对藏羚羊种群大小又进行了估计，指出其数量出现了明显回升。

2011年8月初，当笔者带着两位老师到那曲走访时，和申扎县林业局的局长同行了一段路。路上，他和我们聊起了买巴乡藏羚羊产崽地。2009年，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快速数量评估，当时记录到的藏羚羊有2000多头。2011年，申扎县林业局进行了一次快速观察，记录到藏羚羊数量超过了3000头。这样的定期快速观察，连续起来就是长期监测，可以为藏羚羊及其他物种的数量变化提供十分及时的一手信息。现在，这个信息正在让我们体验着藏羚羊数量增加的欣喜。

## 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之争

当藏羚羊和它的伙伴们经历着变化和转折时，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也开始经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公路修建延伸到偏远地区，牧民及其家畜在50年前仅有野生动物活动的区域开始定居。地方政府的开发计划使大量人口流入这些区域，各项经济政策也影响了原本的土地所有制。于是，整个青藏高原面临了一个更为艰巨而复杂的新挑战，那就是如何维持当地人类社会、家畜和野生动物，以及他们共同依赖的草场资源之间的平衡。随着人口的增加，产业的发展，人类和野生动物对生存空间的竞争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今，随着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野生动物和人类以及家畜的接触增多，其引发的冲突和潜在的健康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气候变化又有可能加剧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在目前已有的草原管理举措中，有一种会对野生动物造成消极影响的新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比如，在羌塘草原的草场上，围栏出现的速度相当迅速。大多数围栏的建造依据的是国家恢复和保护草地的政策。很多村集体和个人看到围栏在划分草场上的优点，也开始建造基于村和家庭为



羌塘的孩子和他们的大山。

单位的围栏。当地人对围栏表示欢迎，不仅因为围栏可以将不同家庭、村庄、乡的草地分隔清楚，而且可以防止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在他们的冬季牧场上活动。然而，长长的围栏把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分成支离破碎的小块，限制了野生动物的行动，尤其是藏野驴和藏羚羊。我们在藏北的旅行中，尤其是南部，常常可以看到绵延数千米的围栏。而南部，正是野生动物种群恢复中最为重要的空间。除了减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和扩散空间以外，围栏还会直接造成藏羚羊和藏野驴的死亡。政策本身的善意，需要合理的措施加以延展。在青藏高原这个野生动物的乐园中，这些人类工作措施的设定，必须慎重考虑野生动物的需求。

## 需逐步引入被全球公认的绿色产业

《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提出划分主体功能区，即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征、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将青藏高原划分为生态安全保育区、城镇环境安全维护区、农牧业环境安全保障区以及资源区和预留区等其他地区，并制订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青藏高原的西北部，主要是西藏自治区的羌塘草原，被设定为生态安全保育区。这一设定，意味着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将高于其他任何开发，为这一区域的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同时，《规划》提出要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以三江源、祁连山等1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点，强化草地、湿地、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自然保护区管护水平。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区曾经都是相对弱化的两个概念，相应的管理部门在整个政府系统中也常常处于被动位置。这份规划对这两项的着重指出和国务院审

议会议时对其特别进行的阐述,将更好地支持有关管理部门的实际工作,也顺应了国家希望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的主张。

《规划》还提出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加快传统农牧业生态转型,促进矿产资源科学开发,合理有序开发水能资源,促进生态旅游健康发展,实施生态移民和传统能源替代。

但是产业的发展,对于藏羚羊和整个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却是一把“双刃剑”。

在青藏高原,畜牧业是主要的收入来源,随着人口增长和群众对收入要求的提高,畜牧业成了过度放牧的主要原因并因此导致草原退化。发展其他绿色产业,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其他经济来源,逐步减少畜牧业给草原带来的压力,减少由此而不断激起的家畜和野生动物竞争食物资源的冲突。对于野生动物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如何设计和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绿色”产业,需要有一个慎重摸索和试点的阶段,不宜过快推广。

原因是,这一区域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禁不起折腾。我国东部较发达地区,在粗放型产业发展中,已经并且正在经历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有些已经无法挽回,比如最近的白鳍豚的消失。青藏高原是以草原为主的生态系统,其发展路径绝不能再重蹈覆辙。有了东部之鉴,青藏高原产业发展必须从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度,通过政策积聚高端智慧人力,用聪慧细致的手笔,逐步引入被全球公认的绿色产业。同时,在这个“绿色”的定义中,必须把藏羚羊和其他生活于此的野生动物作为主要考虑指标,因为有了他们,再好的草原也会失去灵魂。

将游牧向定居发展,是一个仍具争议的问题。牧民家庭若限制在一块确定的区域,可能造成限定区域内的过度放牧。定居所需要的配套措施,比如围栏,不合理的设计会阻碍藏羚羊等物种的大规模移动。牧民定居后,在固定空间中,牧民对可能抢夺家畜饲料的野生动物也会逐渐无法忍受。游牧,这种青藏高原上典型的草

原文化,在这样的发展中逐步消失,是否可惜?这些,都需要在《规划》的实施中谨慎思考。

青藏高原上,有着像羌塘、可可西里、三江源这样广袤的荒野之地。曾经,生活在那里的野生动物数量让人瞠目结舌。早在1903年,一位西方探险者C·G·洛林(C.G.Rawling)曾目睹过这样的藏羚羊群,“在我的视野中,一次至少可以数到15000头,甚至20000头藏羚羊;在一个山坡上有几百只野牦牛在觅食”。

而今,许多关注青藏高原的人,一起目睹着沙化扩增、冰川消融、道路蔓延、人口上升、车辆增加、消耗增多等各种因素,正在不断侵蚀着这片土地,青藏高原的神奇面纱正逐步退去。也许,曾经西方探险家们描述的场景,大部分只能成为遥远的记忆。然而,许多关注青藏高原的人,也一起证实着藏羚羊数量在局部区域逐步回升的事实,这让我们看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看到了局部区域以藏羚羊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希望。

在青藏高原上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重要的是在合适的时间及时开展合理的管理手段。青藏高原有着中国乃至全球屈指可数的大型野生动物群落,尤其是有蹄类物种。这份弥足珍贵的野生动物宝藏可以和非洲的萨瓦纳大草原、北美的黄石公园相媲美。

《规划》的出台,恰逢种种问题和种种希望交织之时。秉承着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和科学发展的主旨,《规划》如果能够当地得到科学合理的落实,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藏羚羊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将在“世界屋脊”之上永世繁衍,生生不息。<sup>[16]</sup>

(作者单位:康蔼黎,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西部分项;毛世平,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林业局)



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母亲和孩子。